

经济危机、战略调整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

王孝松

内容摘要：“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上保持着高速增长，出口流向和进口来源比较稳定，特别是出口市场十分集中。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中间品，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向欧美出口，这种独特的生产、销售网络导致了中国对欧美保持巨额顺差，同时对东亚保持高额逆差。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在参与对外贸易方面能力较弱，而集体和私营企业正在迅速成长。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经济也蓬勃发展，但国内消费能力较弱，不足以担当起拉动世界需求的重任，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重构东亚生产体系、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在“十二五”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经济发展又面临着战略调整的严峻任务。一方面，从总体上说，仍然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摆脱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状况。另一方面，仍然要重视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贸易结构的调整，真正实现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同时努力实现贸易流向的多元化，避免同类商品大量涌入某个特定市场，掌握定价权力、减少贸易摩擦，从而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中国入世以来，对外贸易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2001年中国贸易依存度不到40%，而2007年依存度则超过65%。中国各界在获取对外贸易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外汇储备规模过大、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等问题（Gaulier等，2005，2006；Subbaraman和Sun，2007；Françoise，2010），从而引发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中国政府对这种不平衡增长模式高度重视，在“十一五”规划中强调未来发展要更集中于服务业、集中于本国市场、集中于居民消费。然而，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却未能按照规划的步伐前进，过分依赖外需的状况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平衡状况反而加剧（Liu，2009），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再一次严峻地摆在面前。

特别地，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遭遇了最为惨重的损失，其经济形势滑入谷底。这样，中国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需求锐减，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2008年中国出口额为14286亿美元，而2009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额下降了16%，仅为12016亿美元，低于2007年的水平。2009年，贸易顺差更是比上一年降低了34%，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受到了限制。¹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到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中国政府必将从经济发展全局的层面进行战略调整，而对外贸易将是战略调整中重要的一环。本文聚焦于“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结合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从总体发展、贸易伙伴、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进出口企业性质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回顾，从而归纳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点，指出其症结所在，并结合“十二五”规划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概览

（一）中国入世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已由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因而对外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加入WTO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加速发展的标志，中国入世后第一年，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为5%，经过7年的发展，中国出口额在2009年已占世界总出口额的9.7%，

¹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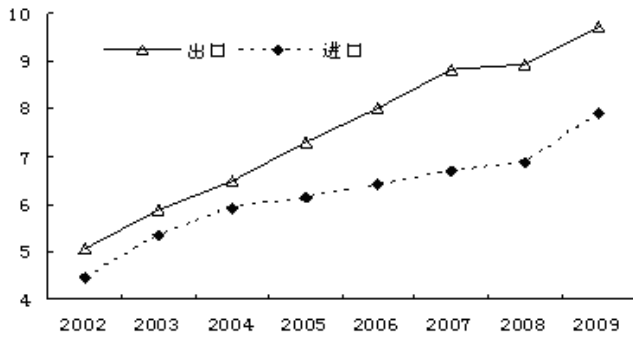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比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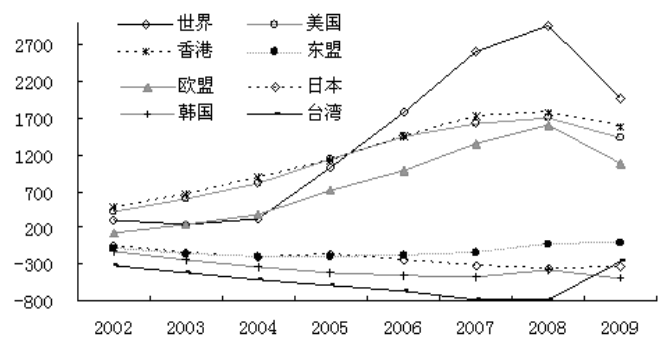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来源 (亿美元)

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图1)。²出口的飞速增长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以市场汇率折算的中国 GDP 将在 2010 年超过日本,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进口方面,中国显示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2002 年,中国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额比重不足 4.5%,而 2009 年这一比重已攀升至 7.9%。实际上,进出口同时大幅增长反映了中国国内的生产、贸易结构和世界生产体系的种种特征,本文会在后面进行详尽分析。

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较大的顺差,从 2002 年到 2009 年,贸易顺差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47%,即使在经济危机蔓延的 2009 年,中国贸易顺差仍达到了 1976 亿美元。但中国并非对任一贸易伙伴均保持顺差,由图 2 可见,中国对美国、香港和欧盟三个经济体保持着很高的贸易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台湾和东盟等东亚经济体均保持贸易逆差。

2002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 428 亿美元,到 2008 年顺差达到 1711 亿美元的高峰,六年间扩大了三倍。2009 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市场需求减少,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达到 1436 亿美元。特别地,从 2002 年到 2005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要大于对世界贸易顺差,这就是说,如果剔除中美贸易,中国在上是净进口国,而且贸易逆差规模很大!中国入世之后,香港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除 2005 年之外,对港贸易顺差均大于对美贸易顺差。然而,由于很多商品是通过香港这扇大门出口到第三方市场,因而对香港的出口额存在着严重高估的现象。反观从香港进口,不仅不存在高估,由于走私活动,反而存在着一定的低估 (Yao, 2007)。所以海关统计的对港贸易顺差严重地夸大了现实。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在入世之初相对较小,但近年来发展迅猛,一路攀升至 2008 年的 1603 亿美元,已十分接近对美和对港贸易顺差 (分别为 1711 和 1778 亿美元)。然而,2009 年,对欧盟顺差降幅高达 32%,远高于对美顺差和对港顺差的降幅 (分别为 16%和 11.5%)。

中国同东亚国家 (地区) 也广泛开展贸易,但对这些经济体均保持贸易逆差。由于同属中华民族并且在地缘上接近,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自于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也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2009 年,中国对台逆差锐减到 266 亿美元,甚至低于 2002 年的绝对量,表现出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中国对发达经济体顺差减小,对台湾的逆差同时缩小,但这种缩小对于台湾的影响更为重要,因为 2009 年台湾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 26%,其贸易顺差总额为 195 亿美元,远低于对华贸易顺差。中国市场的萎缩使台湾的出口和顺差下降了更大的幅度。相似地,中国对东盟、日本、韩国三个经济体也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但对日贸易逆差在 2009 年有所减小,对韩贸易逆差在 08 年减小之后、09 年又迅速上升,并高于 07 年的水平,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则一直波动,在危机的影响下,09 年中国对东盟甚至出现了微小的贸易顺差。

透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欧美、中国、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和贸易联系。当前欧美从中国大量购买的产品是他们曾经从日本、韩国、台湾和东盟购买的,零部件贸易和外包的盛

²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绘图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海关统计。

行构成了独特的生产格局：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中间品，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向欧美出口，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产、销售网络（Woo 和 Xiao，2007）。

（二）“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 2006 年第一季度到 2008 年第三季度，中国出口的同比增长率一直介于 21%至 29%之间（图 3）。但经济危机的爆发对外部需求构成了强烈的冲击，2008 年第四季度，中国出口的同比增长率骤降至 4%，而 2009 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在负 20%左右徘徊。2009 年第四季度，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中国出口摆脱了负增长的状况，略高于 08 年第四季度的出口额。2010 年开始，中国出口恢复了迅速增长的状态，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 29%、40%和 32%，出口的绝对量超过了 08 年的水平。进口额和贸易总额的变化情况也大致相似，只是二者从 08 年第四季度开始便出现了负增长。另外，进口的同比增长率在 2010 年第一季度达到了 65%的高峰，表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了强劲的需求。

2006 年和 2007 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急剧增长，特别是 06 年四季度和 07 年一季度，顺差的同比增长率高达 100%左右（图 4），也正是在 2006 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7 年，面对强劲的出口势头和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减顺差、促平衡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例如调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鼓励技术和资源性产品进口政策，以及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等。这些政策在 2008 年发挥了效果，当年前两季度，贸易顺差同比增长率为负，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得到抑制。然而，中国企业很快适应了新政策，出口额不断扩大，因而 08 年第三季度顺差的同比增长率又恢复为正。08 年第四季度，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蔓延，但中国出口小幅增长而进口大幅减少，因而该季度顺差增长率高达 50%，与此相似，2009 年第一季度顺差的同比增长率超过了 50%。从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危机的影响显著体现出来，09 年二至四季度、10 年第一季度，顺差额都出现了同比大幅下降的趋势。到 2010 年第二季度，由于出口的迅速回暖，贸易顺差又恢复了正的同比增长率。

可见，“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着迅速的增长。用季度数据考察，在危机爆发前，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保持着较高并且稳定的同比增长率。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曾经在 2009 年出现了贸易萎缩、顺差减小的情形，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中国对外贸易又恢复了高速发展的状态。在此期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未得到显著抑制，尽管顺差的同比变化率出现过波动，但从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仍将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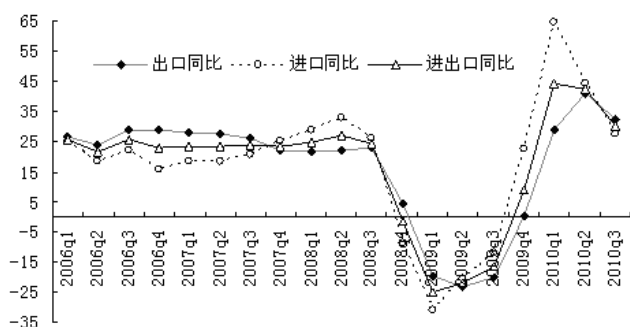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进出口同比变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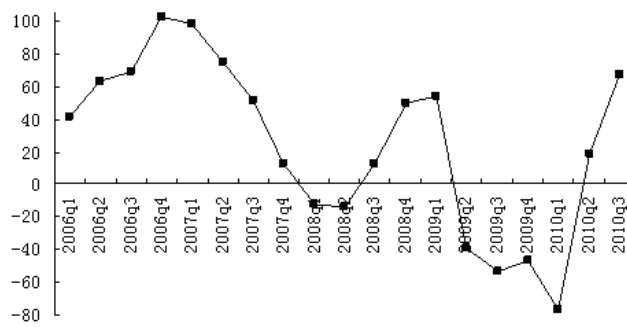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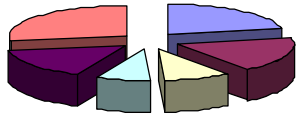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变化率

二、出口流向和进口来源

(一) 中国主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进口来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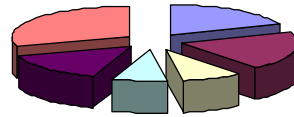
2006年至2009年，美国、欧盟、日本这三个发达经济体，以及香港和东盟是中国最主

(a)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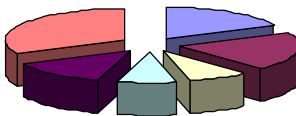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香港 ■其他

(b) 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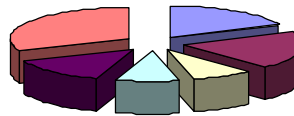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香港 ■其他

(c) 2008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香港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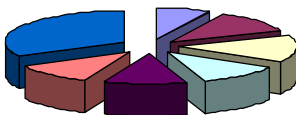
(d) 2009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香港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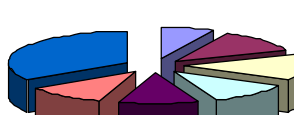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对特定贸易伙伴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a)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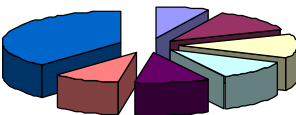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韩国 ■台湾 ■其他

(b) 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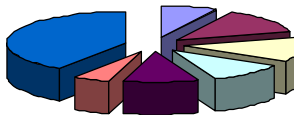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韩国 ■台湾 ■其他

(c) 2008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韩国 ■台湾 ■其他

(d) 2009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韩国 ■台湾 ■其他

图6 中国从特定贸易伙伴进口占总进口比重

要的商品销售市场。2006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1%的中国出口产品流向美国，

而 2007 年这一比重下降到 19% (图 5a、b)。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对美出口的绝对量有所减少,但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却只有微小的下降,2008 年和 2009 年均维持在 18% 左右 (图 5c、d)。这意味着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重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经济危机冲击的是贸易的绝对量,而对相对需求却并未构成冲击。从 2007 年开始,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样,经济危机并未对相对需求构成过大影响,2009 年中国产品出口欧盟的比重同 2008 年相比仅有不足 1% 的下降幅度。“十一五”期间,中国产品向日本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而向东盟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到 2009 年,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比重已超过向日本出口的比重。中国对香港出口比重在 2006 年为 16%,此后逐渐下降,2008 年这一比重已降至 13.4%,2009 年为 13.8%,注意到大量的对港出口最终会转向出口至其他经济体,因而这种下降实际上反映出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进口需求萎缩的状况。

在进口方面,日本始终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06 年和 2007 年中国从日本进口占总进口比重约为 14%,而 2008 年和 2009 年这一比重约为 13% (图 6)。中国从东盟、韩国和台湾的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一直保持在 10% 左右,只有 2009 年中国从台湾进口锐减,仅占总进口的 5% (回顾图 2)。可能的原因在于,受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大陆投资减少,因而 2009 年从台湾进口的金属产品 (钢铁、铜、镍) 较 08 年减小了 30% 至 50%,矿物燃料更是减少了 70%;同时中国出口有所减少,因而对中间品需求下降,09 年从台进口零部件较 08 年下降了 40%。³另外,中国还对进口产品实行差别关税,例如对台湾的石化出口产品征收的平均进口税率为 6.5%,而对东盟同类产品的进口关税率仅为 0.98%,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种关税的差别产生了显著效应,较大程度上阻碍了台湾产品流入中国。但 2010 年前三季度,中国从台湾进口额已达 862 亿美元,超过了 2009 年全年的水平,占总进口比重恢复到 8.5%。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欧盟是中国十分重要的进口来源地,2006 年以来中国从欧盟进口占总进口比重持续小幅上升,2009 年这一比重已接近 13%。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因此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逐渐增加。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比较稳定,四个年度一直保持在 7% 和 8% 之间,考虑到中国巨大的进口额,这意味着中国同样是美国产品重要的销售市场,中美之间贸易依存度很高,二者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十分明显。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出口流向和进口来源比较稳定,特别是出口市场十分集中,中国向美、日、欧这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直在 46% 至 50% 之间,这种情形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显著变化。中国从日本、东盟的进口比重逐渐减小,加上 09 年从台湾进口比重锐减,使得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比重由 2006 年的 67% 下降到 2009 年的 60%,意味着经济危机等因素造成了中国进口来源地的不断分化,进口来源多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

特别地,我们不仅要重视同美国的经贸关系,而且要重视同欧盟的关系,因为欧盟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重要性愈发明显,同时中国从欧盟进口比重稳步提高,中国同欧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

(二) 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之争

本节关注中美双边贸易,突出考察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入世以来,中美贸易加速发展,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更是一路攀升,2002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为 11%,到 2009 年,美国接近五分之一的进口品来自于中国 (表 1)。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比重也持续上升,2002 年对华出口比重为 3.2%,到 2009 年该比重升至 6.6%,七年间扩张了一倍。2010 年前八个月,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作用下,美国从中国

³ 数据来源: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7122

进口比重较 09 年略有下降，而对华出口比重则高于 09 年。

尽管美国同中国之间的进出口额均持续扩张，但由于扩张的速度不同，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加剧。2002 年至 2009 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年均增长率为 12.5%，七年间扩大了一倍。2002 年，对华贸易逆差占逆差总额的 22%，到 2009 年该比重已接近 44%，而 2010 年前八个月仍保持在 41%的水平上。

超过 40%的贸易逆差来自于一个贸易伙伴，使美国各界将本国的失衡归咎于中国，敦促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从 2003 年美国财政部长 John Snow 呼吁人民币应该升值开始，美国国内已经经历了 2005 年和 2007 年两次大规模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浪潮。⁴2009 年以来，尚未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美国各界，在国内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背景下，再一次掀起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高潮，汇率战的硝烟迅速弥漫。

但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生产、销售关系，中国将从东亚经济体进口的零部件加工组装之后，向美国出售制成品，因而美国把进口额全部记在中国帐上，但这些进口产品的附加值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东亚创造的，仅仅是加工组装阶段的附加值由中国创造。而且，对美国民众来说，同中国开展贸易带给他们的是福利的增加：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降低了美国的价格水平，提高了美国人的实际收入。

表 1 美国对华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口额	进口比重(%)	出口额	出口比重(%)	贸易赤字	贸易赤字比重(%)
2002	1334.9	11.12	220.5	3.18	-1114.4	21.97
2003	1632.6	12.53	284.2	3.92	-1348.4	23.32
2004	2105.3	13.8	347.2	4.24	-1758.1	24.87
2005	2598.4	14.98	418.4	4.61	-2180.0	26.33
2006	3057.9	15.94	552.2	5.32	-2505.6	28.48
2007	3401.2	16.83	652.4	5.61	-2748.8	32.06
2008	3563.2	16.42	714.6	5.49	-2848.6	32.80
2009	3095.6	19.28	695.8	6.58	-2399.8	43.75
2010 年前 8 月	2292.1	18.48	558.1	6.78	-1734.0	41.5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网址为 <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400>）；

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网址为 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bp_web/list.cfm?anon=71®istered=0）。

另外，由于中美两国的生产和贸易结构，人民币升值也无助于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为生活必需品，价格弹性很小，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品价格上升，反而会促使进口额上升。对表 1 中“贸易赤字”一栏进行简单计算可知，2003 年和 2004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增长了 21%和 30%，从 2005 年开始，逆差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由 24%下降到 08 年的 3.6%，而 2005 年恰好是中国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升值的年份。由此，美国国内认为人民币升值抑制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增长，并且，2009 年，在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较上一年下降了 15.7%，更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提供了依据。但观察表 1 最末一列，2005 年人民币升值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比重持续上升，贸易赤字的增幅减小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可以缓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也深谙这些道理，其强烈呼吁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压中

⁴ 这两次浪潮的表现：美国学术界计算出人民币低估的幅度，呼吁人民币尽快大幅升值；国会议员不断提出议案，要求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将对中国产品施加额外的贸易壁垒；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并敦促人民币升值。详见高乐咏和王孝松，2008。

国、抑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减轻来自“东方巨龙”的威胁（高乐咏和王孝松，2008）。同时，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政党和候选人可以用中国问题在公众面前做出姿态，以显示其重振经济、扶植弱势企业、增加就业的决心，从而为自己争得更多的选票。

三、贸易结构

（一）各类商品的进出口比重

根据编码协调制度（HS）代码，我们将全部商品划分为 11 大类，各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占全部商品进出口比重列于表 2a 之中。⁵机电产品是各大类产品中出口比重最高的，在 2006 年，该类商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 42.8%，四年间该比重一直较为稳定，2009 年，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至 44.8%，为抑制危机引发的出口剧烈下滑做出了突出贡献。纺织品与服装、鞋帽是中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其在“十一五”前四年的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 16%左右，出口比重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杂项制品（主要是家具、玩具和光学仪器），四年间，其出口比重一直接近 10%。2009 年，以上三大类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 70%，表明中国出口部门十分集中。此外，金属产品的出口比重也较高，同样为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

通过出口比重数据，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即“十一五”期间中国出口产品是否实现了技术升级。通常认为机电产品中有很多属于高新技术产品，而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很高，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很高？⁶实际上，按照 HS 代码进行分类之后，属于同一大类的产品之间技术含量存在迥然差异，即使具体到 HS 十分位，相同代码的产品技术含量仍会存在不同（Yao，2007）。特别是在国际生产分割盛行的条件下，一件高技术产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在不同国家完成（Hummels 等，2001），而中国境内主要进行劳动密集型阶段的生产，从东亚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品和零部件，经过组装加工后出口技术密集型的成品。因此，高额的机电产品出口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实现了技术升级。

在进口方面，机电产品也是占比最高的一类，2006 年机电产品进口比重为 41.5%，此后略有下降，2009 年该比重为 36.6%，但由于中国进口总额很高，因此机电产品进口的绝对量十分可观。由于中国国内的特定生产结构，以及投资的迅猛扩张，中国经济对能源的需求日益膨胀，因而矿产品进口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很高，2006 年为 15.7%，2008 年达到 23%的高峰，2009 年回落到 19.5%，这样高的比例表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十分旺盛，中国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世界能源紧缺的重要原因。

依据联合国主要经济类别（BEC）分类方法，可以考察中国不同生产阶段商品的贸易状况。⁷“十一五”期间，中国对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张，初级产品的进口远大于出口，逆差由 2006 年的 1283 亿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2717 亿美元，2009 年回落到 2196 亿美元（表 2b，图 7b）。在中间品贸易方面，除 2008 年之外，中国的需求略大于供给，但将中间品分为半成品和零部件之后，可以明显看出后者是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而前者在大多数年份呈现出小额顺差。最终产品的出口比重接近 60%，而消费品的出口比重高达 30%左右，但最终产品的进口比重，特别是消费品的进口比重却小得多，尽管四年间消费品

⁵ 关于划分产品种类的具体方法，可参加 Yao（2007），也可向作者索取。

⁶ 按照本文的划分方法，机电产品包括 HS 两分位下的第 84 章“机器、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和第 85 章“电器、电子装备及其零部件”；而中国海关统计中机电产品包括“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电子产品、电器产品、仪器仪表、金属制品等及其零部件、元器件”（见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 2008 年共同制定并发布的《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中国海关统计报告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更高，2006 年至 2009 年出口比重分别为 56.7%、57.6%、57.6%和 59.3%，而 2010 年前三季度比重为 58.8%。

⁷ 根据 BEC 分类方法，全部商品可以分为初级产品、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三大类，其中中间品又可分为半成品和零部件两类，最终产品又可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两类。关于具体划分方法，可参加 Gaulier 等（2006），也可向作者索取。

进口比重持续上升，但 2009 年该比重刚刚超过 5%。这样，最终产品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2008 年顺差为 5540 亿美元，2009 年在危机的影响下仍达到 4997 亿美元。

表 2 各类商品进出口比重 (%)
(a) HS 分类方法

商品类别	出口				进口			
	2006	2007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2009
动植物、食品	4.72	4.26	4.00	4.57	3.79	4.20	5.07	5.18
矿产品	2.21	2.01	2.55	1.90	15.71	16.99	23.14	19.56
化工产品	3.91	4.20	4.82	4.50	7.12	7.19	6.82	6.93
塑料橡胶	3.07	3.01	2.90	2.99	5.86	5.76	5.39	5.88
木制品	1.74	1.69	1.53	1.61	2.33	2.36	2.26	2.28
纺织服装鞋帽	17.00	16.20	15.10	16.30	3.36	2.76	2.32	2.29
石和玻璃	2.32	2.18	2.17	2.33	1.08	1.13	1.09	1.07
金属产品	8.82	9.50	10.10	6.43	7.57	8.14	7.05	8.63
机电产品	42.80	43.40	42.70	44.80	41.55	39.95	35.91	36.63
运输工具	3.98	4.51	4.95	5.01	3.77	3.67	3.52	4.29
杂项制品	9.40	9.04	9.17	9.58	7.92	7.82	7.39	7.23

(b) BEC 分类方法

商品类别	出口				进口			
	2006	2007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2009
初级产品	1.42	1.21	1.29	1.02	17.93	19.84	25.62	23.05
中间品	39.65	40.27	41.8	37.72	56.51	55.37	49.73	52.92
半成品	22.22	22.98	24.37	20.12	25.97	25.98	23.68	25.72
零部件	17.43	17.29	17.42	17.60	30.54	29.39	26.05	27.20
最终产品	57.93	57.55	55.8	59.99	22.57	22.78	21.58	22.00
资本品	26.84	27.93	27.89	29.93	19.16	18.23	16.91	16.77
消费品	31.09	29.63	27.91	30.06	3.41	4.55	4.67	5.23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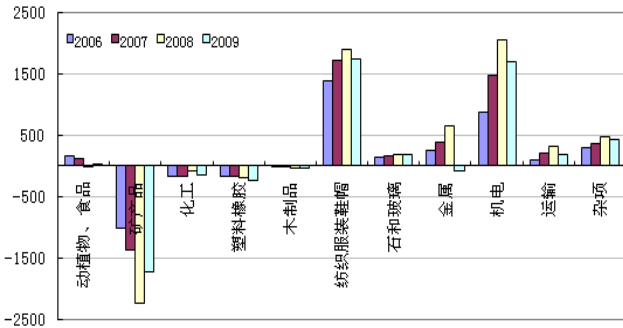
(二) 各类商品的贸易差额

在我们考察的四年中，纺织服装鞋帽有三年为中国对世界顺差最大的一类商品，只有 2008 年排在机电产品之后位居第二（图 7a）。纺织品和机电产品的顺差规模很大，前者介于 1300 亿美元和 1900 亿美元之间，而后者更是从 06 年的 860 亿美元飙升至 2008 年的 2057 亿美元。杂项产品和金属产品的顺差规模也较大，但前者的顺差额持续上升，而后者在 2008 年达到 645 亿美元顺差的高峰之后，2009 年出现了 93 亿美元的逆差。另外，运输工具、石和玻璃、动植物和食品也一直保持顺差。由图 7a 清晰可见，这些存在顺差的商品在 2009 年均出现了顺差回落甚至转为逆差的情形，说明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顺差，且这种抑制作用对各类商品均产生了效应。

按照 BEC 分类方法，初级产品和中间品在“十一五”期间均呈现出逆差，但最终产品的顺差远大于其他两类商品的逆差，因而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保持巨额顺差。这样，中国进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之后出口的格局清晰地展现出来。根据 Koopman 等（2008）的测算，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要素含量约为 50%，而高新技术产品的

国外要素含量则高达 80%。根据我们的数据展示，中国传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在“十一五”期间并未发生明显改观，这就蕴含了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等问题，并且引发人们思考：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额之下，中国究竟能获得多少贸易利益。

(a) HS 分类标准



(b) 按生产阶段划分 (BEC 分类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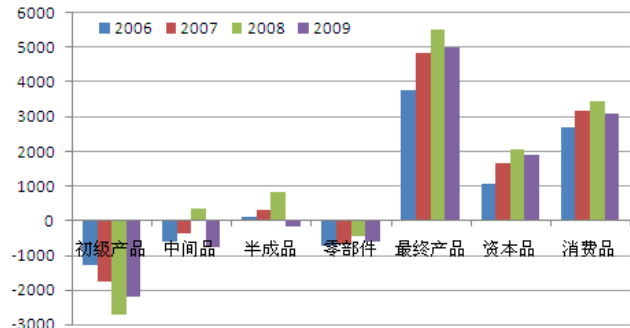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对世界各类商品贸易差额 (单位: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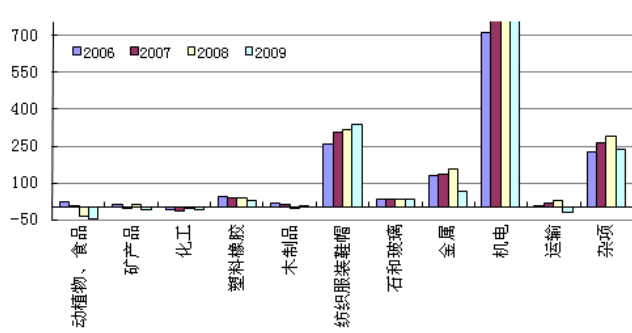
中国的大多数商品均保持对美顺差，特别是机电产品和纺织品。在 2006 年，机电产品对美顺差达到了 711 亿美元，到 2008 年顺差提高到 875 亿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影响的 2009 年，机电产品顺差仍高达 824 亿美元（图 8a）。纺织服装鞋帽和杂项制品在对美贸易中也存在较大的顺差，并且前者的顺差连年扩大，表明美国消费者对质优价廉的中国纺织品十分青睐，在危机爆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对中国纺织品、家具、玩具等产品的需求仍然旺盛。2009 年，动植物和食品、矿产品、化工产品、以及运输工具是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来源，但数额很小，不足以扭转巨额的对美贸易逆差。按照 BEC 分类方法，中国在初级产品贸易方面对美存在逆差，其余各类产品均保持高额顺差（图 9a）。初级产品从美进口主要集中在工业供给品和粮食方面，前者的逆差在四年间一直维持在 65 到 82 亿美元之间，而后者的逆差从 06 年的 27 亿美元逐步上升至 09 年的 94 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 2.5 倍

除运输工具外，中国在其他所有大类产品上均对欧盟保持贸易顺差（图 8b）。其中最大的顺差来源于机电产品（四年平均顺差 600 亿美元），随后依次是纺织品（475 亿美元）、金属产品（440 亿美元）和杂项产品（334 亿美元）。其余各类商品的顺差相对较小，四年平均值小于 100 亿美元。对欧盟出现顺差的各类商品，其 2009 年的顺差额均小于 2008 年的数额，体现出经济危机对欧盟市场的影响。中国是欧盟运输工具的净进口国，贸易逆差由 2006 年的 33 亿美元逐步上升至 2009 年的 77 亿美元，但相对于其他类商品的顺差而言，运输工具的逆差规模十分有限。从生产阶段来看，中欧贸易格局与中美贸易格局类似，仅在初级产品上存在小额逆差；其他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在各年均保持着大幅顺差（图 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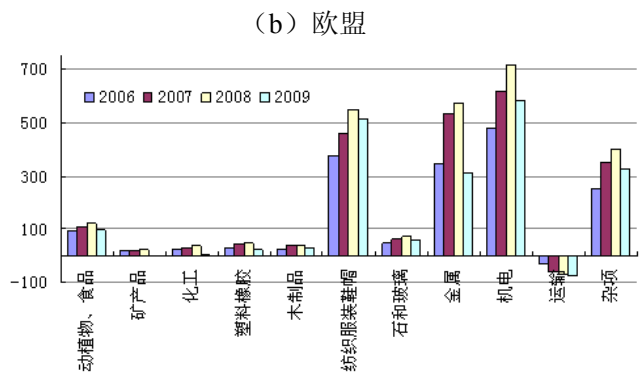
中国对日本在纺织品、动植物和食品、木制品方面存在顺差，而在其他各类产品上均存在逆差，体现出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感（图 8c）。中日初级产品贸易几乎是平衡的，中国在工业供给品方面存在逆差，在粮食和燃料方面存在顺差，2006 年至 2008 年，收支大体相等，而 09 年中国逆差略有增加，达到了 17 亿美元（图 9c）。中国在中间品方面，无论是半成品还是零部件，均对日存在大幅逆差，最终产品总体上保持顺差，但资本品存在着 100 亿美元左右的逆差。

在各类商品贸易中，中国对香港均存在顺差，其中机电产品为顺差的最重要来源，2007 年之后顺差一直处于 1000 亿美元以上，而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的顺差也相对较大（图 8d）。按 BEC 分类方法，中国在初级产品方面对香港存在微小的逆差，在其他产品方面均存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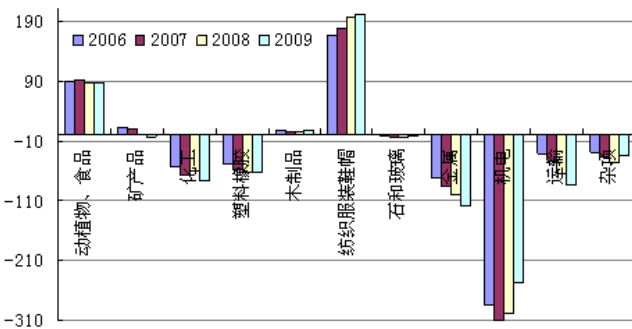
(a) 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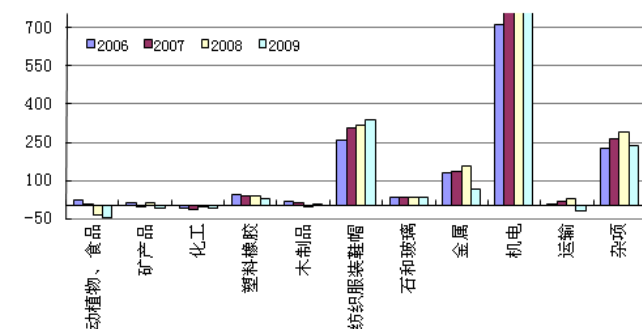
(c)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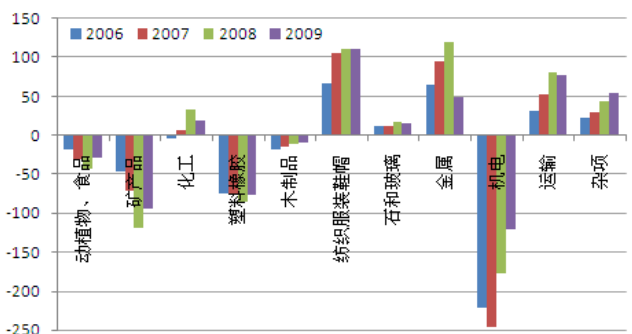
(b) 欧盟



(e) 东盟



(d) 香港



(f) 韩国

图 8 中国对特定贸易伙伴各类商品贸易差额 (HS 分类标准, 单位: 亿美元)

幅顺差 (图 9d)。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的最大逆差来自于机电产品, 而对香港和欧盟的最大顺差来自于机电产品, 对美贸易顺差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机电产品 (图 8a 至 f)。按商品的生产阶段划分, 我们发现中国对日本、东盟和韩国在中间品上存在高额的逆差, 2009 年对这些经济体的中间品逆差分别为 570、129 和 445 亿美元 (图 9c、e、f), 这充分表明了从中国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 在国内加工组装之后将成品出售到欧美和香港的三角贸易特征。通过中国对外贸易在地理上的非对称性, 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中国生产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欧美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源于国际生产分割等现实均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

中国同日、韩、东盟间的贸易结构存在着一定差异, 中国对东盟在资本品和消费品上均存在顺差, 因而最终产品的顺差是两个子类顺差的加总; 对日贸易中, 在最终产品上整体存在顺差, 但资本品存在逆差; 对韩贸易中, 资本品逆差额高于消费品顺差额, 导致对韩贸易最终产品呈逆差。而且, 东盟中间品对中国的顺差由 2006 年的 198 亿美元下降到 2009 年的 129 亿美元, 反映了各国所处生产阶段的动态变化过程: 中国在机电产品和其他高技术产品

的生产过程中，从东亚经济体进口关键投入品，日、韩、东盟等处在较高生产阶段的经济体在零部件上存在对华顺差，同时日、韩在资本品上也存在顺差，且顺差较为稳定，但东盟仅在零部件上存在逆差，且逆差逐渐缩小，不仅说明同日、韩相比，东盟出口至中国的中间投入品处于较低端的水平，而且说明中国的生产阶段正在逐步赶超东盟，同东盟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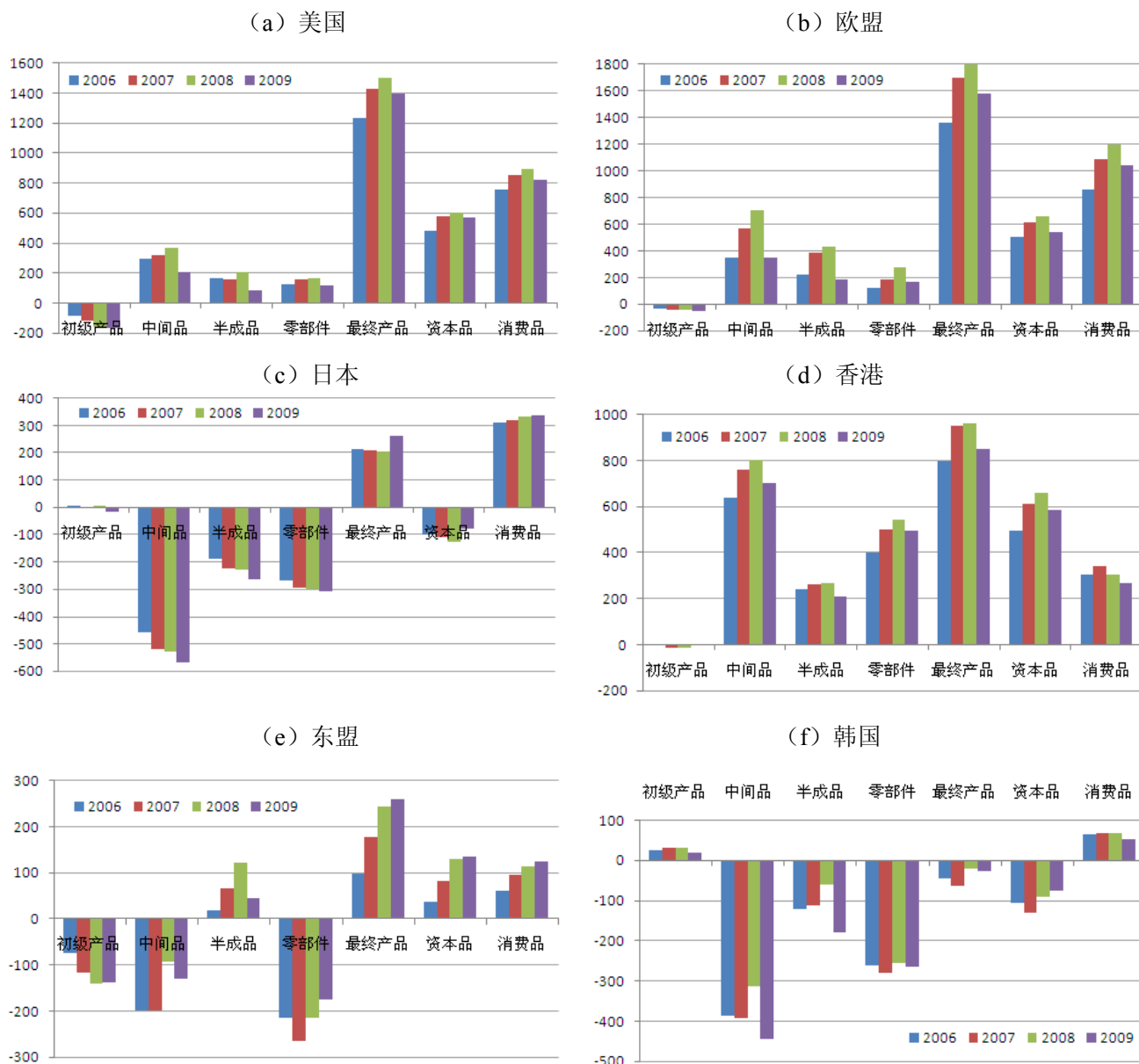


图9 中国对特定贸易伙伴各类商品贸易差额（BEC分类标准，单位：亿美元）

四、贸易方式和进出口企业性质

（一）中国对外贸易方式

“十一五”期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一直大于一般贸易出口额（图10）。这就反映出大部分中国出口产品仍处于加工组装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同中国对外贸易的各个方面又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中间投入品，进行加工之后出口产成品，同一件产品两次跨越中国关境，使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同时大幅增加，于是中国对外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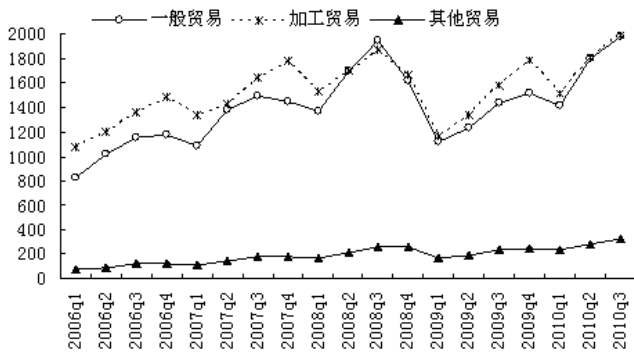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出口额：按贸易方式划分(单位：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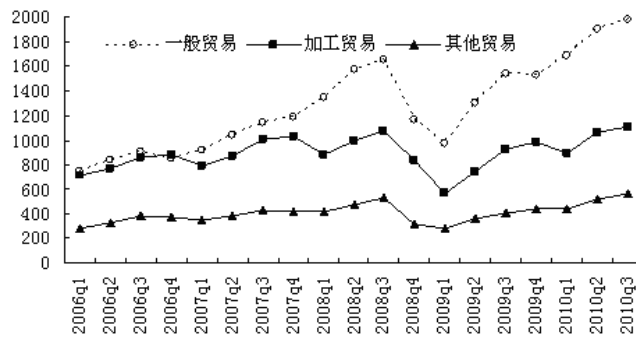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进口额：按贸易方式划分(单位：亿美元)

额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将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合并在一起，其在“十一五”期间的大多数季度均呈现贸易逆差，而加工贸易始终保持大幅顺差（图 10、11），这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是由加工贸易贡献的。此外，加工贸易还使中国出口品实现了技术升级，正因为关键的零部件是从东亚进口的，中国才得以出口大量的高技术产品，从而在表面上看，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Rodrik, 2006）。

“十一五”之初，中国的一般贸易呈现出顺差，表明中国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从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的一般贸易呈现出逆差，2010 年上半年逆差迅速增加，逆差额已达 371 亿美元，第三季度一般贸易才有所起色，出现了 6.7 亿美元的小额顺差。一般贸易的主要中间投入品是国内生产的，因而一般贸易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经济危机导致中国一般贸易由顺差转向逆差，意味着中国各界为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技术升级仍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中国进出口企业性质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驱动的（Gaulier 等，2006；Li 和 Wang，2009），在“十一五”期间，这种状态得到了延续。各类企业的出口额均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尽管从 2008 年第四季度开始下滑，但 2009 年第一季度跌入谷底之后便开始反弹（图 12）。2010 年第三季度，外资企业出口 2333 亿美元，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其他企业（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出口额也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只有国有企业的出口增幅缓慢，2010 年第三季度的出口额低于 2008 年第三季度的水平。

在进口方面，外资企业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一五”期间在各类企业中所占进口份额最大，平均达到了 56% 的水平（图 13）。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大于其他企业，表明外资企业的生产对国外的中间投入品更为依赖。受经济危机影响，各类企业的进口额在 2008 年第四季度均有下降，但从 2009 年第一季度触底后又迅速反弹。

这些现象反映了全球生产分割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外包策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欧美跨国公司的很多供应商从前坐落在东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供应商将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仍销售给欧美的跨国公司，致使中国的出口额迅速扩张。这样，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也促使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迅速增长（Jarreau 和 Poncet，2009）。

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出口能力高于国有企业，意味着在贸易权全面放开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领域已经无法同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对抗。根据 Melitz (2003) 的理论，一个行业内生产率高的企业从事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从事内销，那么说明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整体上低于其他两类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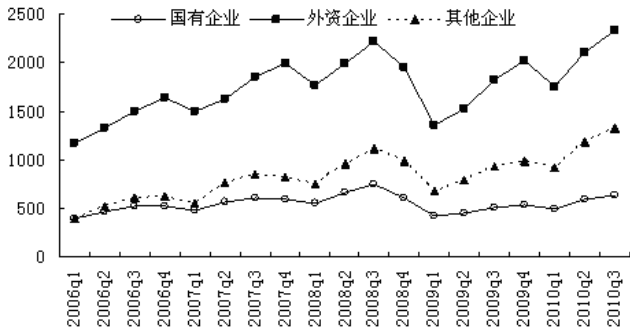


图 12 各类企业出口额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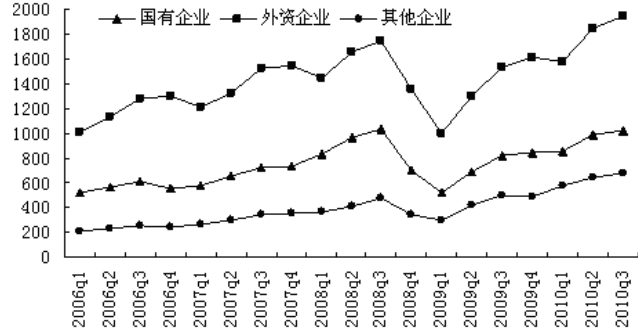


图 13 各类企业进口额 (亿美元)

表 3 中国对外贸易：企业性质与贸易方式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2006	2007	2008	2006	2007	2008	2006	2007	2008
总出口	58	57	55	20	18	18	22	24	27
一般贸易出口	12	13	14	13	12	11	18	20	21
加工贸易出口	44	43	40	5	5	4	3	3	3
总进口	60	59	55	28	28	31	12	13	14
一般贸易进口	13	15	16	21	21	25	8	9	10
加工贸易进口	35	32	28	4	4	3	2	2	2
贸易差额	90	136	171	-34	-45	-97	120	171	221
一般贸易	12	9	8	-40	-56	-116	111	157	198
加工贸易	157	212	254	20	22	24	12	16	19

注：前六行为各项内容占进口总额或出口总额的百分比；后三行为绝对值，单位为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Françoise (2010)

从 2006 年至 2008 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为 55% 至 60% 之间，其中加工贸易出口比重持续降低，而一般贸易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的比重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表明外资企业越来越重视本土化经营（表 3）。私营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持续上升，标志着私营企业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在对外贸易领域不断扩张，而私营企业扩张也是通过一般贸易的增长来实现的。外资企业的进口比重在三年间小幅下降，但一般贸易进口的比重上升，说明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地销往国内市场，而出口产品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国内的中间品（结合外资企业的出口状况）。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均保持顺差，但前者的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后者则主要来源于一般贸易。而国有企业整体上则处于逆差状态，逆差主要来源于一般贸易。

五、对外贸易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对外贸易在“十一五”期间迅猛增长，尽管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外部需求锐减，但很快恢复了高速增长的气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持续增长的气势还将得到维持。反观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了最严重的冲击，经济复苏十分缓慢，当前其国内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说明中国经济将成为拉动世界需求的引擎。

2009 年，中国进口需求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已达到 8%（图 1），但区分了进口品的生产阶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进口品是由中国企业的出口“引致”的，这部分“引

致”需求将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而逐渐增加。真正能体现中国需求能力的是消费品进口，而“十一五”期间中国消费品进口占世界消费品进口比重很低，到2009年仅为2.1%（表4）。当然，相比于2006年的1.29%，这一比重已经提高了60%，但即便按此速度稳定增长下去，相对于美国、欧盟来说，中国的消费品进口在世界的地位仍然较低，不足以担当拉动世界需求的重任。

实际上，中国消费品进口额相对较小，同内需相对不足是紧密相关的。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拉动，国内消费占GDP比重在“十一五”期间也持续下降，这样，在内需不足的同时，对外需求也相对不足，因此才出现GDP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消费品进口占世界比重相对较低的情形。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未来的重要任务还是要努力扩大内需，我们不奢求中国成为世界需求的引擎，只希望中国在国内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取得平衡，使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对外贸易在短暂的下滑之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我们在庆幸外部需求回暖的同时，不要忘记扩大内需、进行战略调整的任务。因为过分依靠外部需求将会受制于人：发生经济危机时外需减少，国内经济受到牵连；全球经济运行良好时，也会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问题而遭遇严厉的贸易壁垒，甚至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受到歧视性待遇（王孝松和谢申祥，2009）。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能成为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力。由于中国从东亚国家大量进口中间品，因而中国市场对日、韩、东盟、台湾等经济体十分重要，这些经济体的很多厂商实际上在定向生产销往中国的产品，中国同这些经济体之间的生产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东亚经济体放弃了过分依赖欧美市场的梦想，开始重视国内需求；但这些经济体国内需求相对较小，于是他们转而谋求在东亚内部寻找市场。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以中国为纽带，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2010年中国同东盟主要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与台湾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简称ECFA）也将于2011年初生效，这些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利于中国同东盟、台湾间贸易的发展，而且将加速日、韩同东盟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这一切都将使东亚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前进。

表4 主要经济体消费品进口占世界比重(%)

经济体	2006	2007	2008	2009
中国	1.29	1.48	1.67	2.08
美国	21.38	19.59	17.88	18.54
欧盟	13.93	14.05	13.93	15.20
日本	4.72	4.23	4.23	5.16
韩国	1.01	1.05	1.02	1.07
香港	2.85	2.76	2.74	3.07
东盟	2.09	2.07	2.36	2.36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

六、结论性评述

“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上保持着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曾经在2009年出现了贸易萎缩、顺差减小的情形，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对外贸易又重现高速发展的状态。在此期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未得到显著抑制，并且未来中国仍将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出口流向和进口来源比较稳定，特别是出口市场十分集中，中国向美、日、欧这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直在46%至50%之间，这种情形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危机等因素造成了中国进口来源地的不断分化，进口来源多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在进出口两方面，中国同欧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都不断加强。

中国同欧美、东亚经济体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关系，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中间品，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向欧美出口，这种独特的生产、销售网络导

致了中国对欧美保持巨额顺差，同时对东亚保持高额逆差。

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尽管一般贸易在“十一五”期间有所发展，但为了实现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技术升级的目标，一般贸易还要继续获得长足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参与对外贸易方面能力较弱，而集体和私营企业正在成长为对外贸易领域的一股新势力。

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国内经济也蓬勃发展，但国内消费能力较弱，不足以担当起拉动世界需求的重任，而中国贸易发展对重构东亚生产体系、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在“十二五”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经济发展又面临着战略调整的严峻任务。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仍然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摆脱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状况。2009年，广东省的GDP增长率在中国各省区排名最末，主要原因便在于广东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外部需求锐减对其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冲击。广东GDP增长率最低的现象还缘于中央应对经济危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与广东关联很小，因而广东并未从投资计划中获益。实际上，中央的投资计划表明了政府进行战略调整的导向性，即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植力度，以减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这样的导向之下，出口依存度高的东部沿海各省要相应进行调整，更为重视国内市场，减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

另一方面，仍然要重视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贸易结构的调整，摆脱“进口中间品——组装——出口制成品”的生产和贸易格局。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商不能仅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阶段，要加强研发，向高端生产阶段过度，真正实现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同时努力实现贸易流向的多元化，避免同类商品大量涌入某个特定市场，掌握定价权力、减少贸易摩擦，从而获得更高的贸易利益，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乐咏、王孝松，2008，“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探讨：政治经济学视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2. 王孝松、谢申祥，2009，“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第12期。
3. Françoise Lemoine, 2010, “Past Successes and New Challenges: China’s Foreign Trade at a Turning Point.”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3, pp. 1–23.
4. Gaulier G., F. Lemoine & D. Ünal-Kesenci (2006), “China’s Emergence and the Reorganisation of Trade Flows in Asia”, *CEPII Working Paper*, n°2006-05, March.
5. Gaulier G., F. Lemoine & D. Ünal-Kesenci (2005), “China’s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oduction Sharing, FDI & High-Tech Trade”, *CEPII Working Paper*, n°2005-09, June.
6. Hummels, D. Ishii, J. and Yi, K.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 75-96.
7. Jarreau, Joachim and Sandra Poncet, 2009,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CEPII Working Paper* No. 34,
8. Koopman Robert,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2008, “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109
9. Li Kunwang and Wang Xiaosong, “China’s Foreign Trade: Trends and Issues after WTO Accession”, in Chen Chunlai Eds,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WTO Accessi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June, 2009.
10. Liu, Ligang, 2009,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7, No. 6, pp. 1 - 23.

11.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pp 1695- 1725.

12. Rodrik, Dani, 2006, “What’ s so Special about China’ 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4, No. 5, pp. 1 - 19.

12. Subbaraman Rob and Sun Mingchun (2007), “China’s Re-emerg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Assessing the Implications”. *Lehman Brothers working paper*. January, 2007

13. Woo Wing Thye and Geng Xiao, “Facing protectionism generated by trade disputes: China’s post WTO blues.” 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NU Press and Asia Pacific Press, 2007. pp. 45~70.

14. Yao Shunli, 2007, “Chinese Foreign Trade Performance and the China-US Trade: 1995- 2004——A Graph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Customs Statistics”. *CC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E2007009.